

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

王 北 辰

(北京大学 地理学系)

提 要

本文探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和田以东至若羌间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1, 历史时期, 塔里木盆地南沿上是否有过一条与北方塔里木河相对应的“南河”? 笔者认为是没有的。2, 自古以来, 和田以东的绿洲数目是在逐期增多或是逐期减少? 笔者认为逐期增多。3, 历史时期, 和田以东出现过几处绿洲城镇废弃和交通路线改线的现象, 笔者就其中的安迪尔、且末、尼雅三地的历史演变作了初步探讨。

1980年6~8月间, 我有幸参加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主持的新疆“丝绸之路”沿线沙漠考察工作。在南疆和田以东至若羌间近三个月的野外工作中, 发现了许多有启发性的问题, 现先就三个历史地理问题提出蠡测管见, 作为引玉之砖, 供有关部门参考, 并正于学界。

我国古代, 把玉门关(甘肃、敦煌县城西北80公里的小方盘城)、阳关(甘肃敦煌县城西70公里的古董滩上)以西、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广大地区泛称为西域。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中期的《汉书·西域传》, 对西域各国, 分按南北两道自东而西依次记述: 出玉门关, 傍北山(指今天山山脉)而西, 经焉耆、龟兹、温宿等国, 再越葱岭向西是谓“北道”; 出阳关, 傍南山(指今阿尔金山、昆仑山脉)而西, 经鄯善、且末、于阗等国, 再越昆仑或葱岭而西是谓“南道”。本文探讨的问题限在今和田以东至若羌之间, 地属古之南道, 故题为“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

一、南 河 辨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上, 绵亘着阿尔金山脉、昆仑山脉。源出山地北坡诸水, 都平行地自南向北奔流。其西段, 水量丰富的叶尔羌河、提兹那甫河、和田河等, 穿越沙漠一直北注塔里木河; 中段的克里雅河、尼雅河等, 下尾消失在沙漠之中; 而东段的车尔臣河, 出山北流不远即转向东北, 注入台特马湖(现已干涸)。这是现代塔里木盆地南沿上的水系形态。

本文1982年6月16日收到, 1983年3月28日收到修改稿。

* 1980年夏,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派队赴南疆考察, 邀请候仁之教授参加, 候先生因故不能参加, 乃派我参加了野外工作。考察队员有沈竟琪、高前兆、胡智育, 司机王国英、胡正前。

在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南沿的水系是否有过重大的变迁？是否有过一条自西而东沿途收纳上记诸水汇为一条东注牢兰海（今罗布泊）的大河？这是西域南道历史地理的一个大问题。

南河首先是在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里提出来的。《水经注·河水二》¹⁾里记叙，河水出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分为两支：一支东北流，经捍弥（今喀什）、温宿（今温宿）、龟兹（今库车）、焉耆、楼兰等城南，又东注入阾泽即牢兰海（今罗布泊）、是为“北河”。又一支自葱岭岐沙谷（不明）东流经皮山（今皮山绿洲）北，右纳于闐河（今和田河），再经于闐（今和田）、捍弥（今于田）、精绝（今民丰县、尼雅河下游、尼雅废墟）、且末（今且末）诸国之北，又右纳阿耨（nou）达大水（今车尔臣河），又经鄯善国（今若羌）北，东注牢兰海即阾泽，是为“南河”²⁾。

酈道元所记的南河，我们无法在现代地图上复原，但既然记说河道流经今皮山、和田、于田、民丰之北，下游又与车尔臣河合流而入罗布泊，则南河势必沿途截纳平行北流的和田河等诸水，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而东流。这样大的一条河，在现代地图上既无河道也无残迹，当然要引起人们的疑问：是果有南河以后被流沙湮没了呢？还是河流改道迁徙了呢？或是根本就不曾有过，古籍误记了呢？以下试从古典文献记载以及现代地理考察的成果两方面探讨。

首先从古籍入手。我国记载西域地理最早应推《史记·大宛列传》，其记西域水道云：“于闐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于闐指今和田，盐泽指今罗布泊。当时人认为黄河之源出自于闐，东流入盐泽，伏流一段再涌出为黄河。所记水道显然是一条河而不是两条河。

其后，东汉初年，《汉书·西域传》记西域水道云：“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下略）”。明确指出，从葱岭发源的葱岭河东流，右纳从南山（指昆仑山）发源北流的于闐河（今和田河），两源汇为一条大河东注蒲昌海。但其在叙述西域道路时却又说：出玉门关，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盆地），循北山，沿河西行为北道；出阳关、傍南山、沿河西行为南道。似乎南北两道分沿南北两河而西行，则塔里木盆地在汉代必有两条大河，在北的是北河，在南的是南河。其实不然，《西域传》里南道所沿的河是指今车尔臣河，北道所沿的才是葱岭、于闐二源汇成的大河，前后并不矛盾，只是由于班固未能分别记出南北两河的名称，才造成上记含混。

后汉经营西域，史称其三通三绝也即反复了三次，班超的活动主要在南道，他往返在鄯善、于闐、疏勒之间，对南道的地理很熟悉。且曾派甘英出使大秦。《后汉书·西域传》就是以这些新资料为基础而撰写的，因而比《汉书·西域传》又有进步。《后汉书·西域传》关于水道的记载与《汉书》一致，也说西域只有一条大河独流注入蒲昌海。

大约在东汉末年或三国时期（公元三世纪早期），桑钦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水道专著《水经》，《水经》记西域水道云：“〔河水〕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其一流出于闐国南山，北流

1) 据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

2) 各地今址的论证见下文。

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所记与两汉书西域传同，明白指出葱岭河出山后是东北流的，从所记流向看，葱岭河指今之叶尔羌河。

以上检读了酈道元以前的四种古典地理著作，它们一致记说葱岭河与于闐河合而为一，东注蒲昌海，只有一条大河，并无南北之分。且葱岭河既东北流而后右纳于闐河，合流后的大河必指今之塔里木河古道¹⁾。

以下检读与《水经注》同时的古籍。其一，北魏政府在公元435—440年间，曾派董琬一行出使西域，董琬及其后出使西域者的报告内容都收在《魏书·西域传》里，《魏书》只记有于闐河，说于闐河有两源，西源为达利水、东源为首拔河，两源合为于闐河，并未提到有南河。其二，北魏的宋云与惠生等去印度求经，宋云的旅行记收在《洛阳伽兰记》²⁾中，他们所走的正是西域南道，经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若羌、且末而抵和田，但从宋云行记里看不出南河的迹象。

到了隋、唐两代，对西域的了解较之汉魏又有前进，记载也较多。公元六世纪八十年代，隋朝曾在鄯善与且末分别设郡，《隋书·地理志》记，且末郡境内有且末水（今车尔臣河），鄯善郡有蒲昌海、鄯善水（今若羌河），隋代的且末、鄯善两郡地处今车尔臣河下游，倘有南河那样的大水，《隋书》决不会略而不记，它只记且末水与鄯善水，足证当时当地并无南河。

公元七世纪，玄奘去印度取经，归途先到于闐，循南道东趋沙州（今敦煌）而回长安。玄奘撰述的《大唐西域记》及其弟子慧立、彦惊所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叙于闐以东的地理较详，两书都未提到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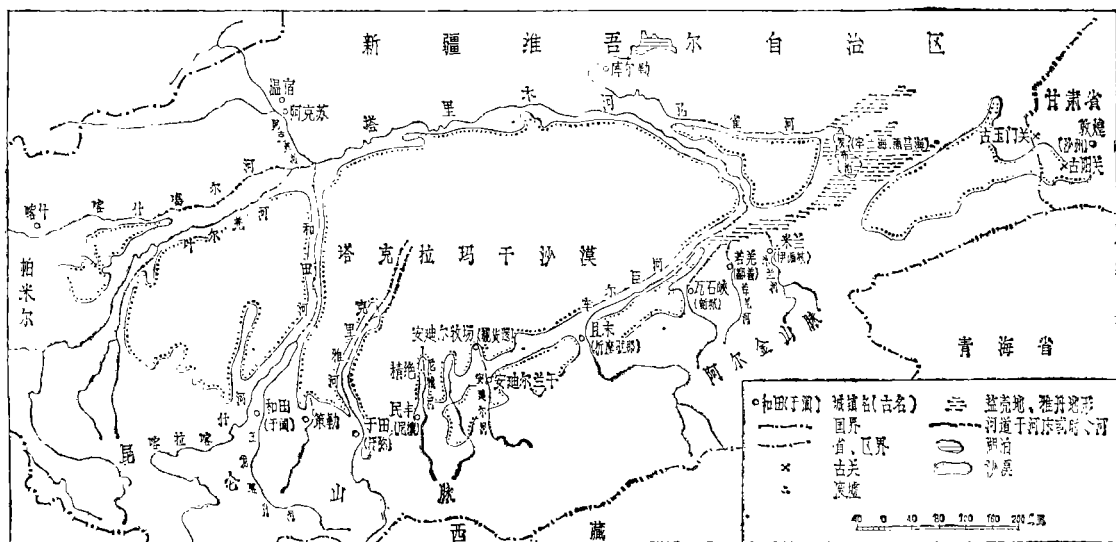
本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从我甘肃敦煌石窟中劫走了上千件古文书，其中有几种唐代沙州人所编的地方志，其成书较早的是《沙州图经》、《沙州、伊州地志》³⁾，两书是当时当地人所编，而鄯善、且末在唐代又隶属于沙州，故两书记叙鄯善、且末之地理翔实可信，若当地果有南河两书不会忽略。《沙州图经》道路项下记：“从镇（石城镇、今若羌）西去新城二百四十里。从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镇（指今且末）六百一十里”。其所傍之河，据《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播仙镇故且末国也（中略）湟末河源从南山大谷口出，其源去镇城五百里经且末城下过，因以为名（下略）”即且末河、今之车尔臣河。两种古方志中皆无南河之记。

1) 见新疆综合考察队地貌组编《新疆地貌》十五章.四.塔里木河。科学出版社，1978年。

2) 见周祖谟：《洛阳伽兰记校释》，182页以下，中华书局，1963年。

范祥雍：《洛阳伽兰记校注》，25页以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 《沙洲图经》残本是伯希和劫走的古书，罗振玉得之，印入其《敦煌石室遗书》中，题为《沙洲志》，后又印入《鸣沙石室遗书》。王重民在其《敦煌古籍录》（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中收其原文，考订其成书在武后证圣年间（约695年），晚于《大唐西域记》半个世纪。日本东洋文库，搜集了各种有关的照片资料，池田温据之复原了原文，所缺则补以《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寿昌县地境》等作为参考。池田文题为“沙州图经略考”，收在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中，笔者据池田文。《沙洲·伊州地志残卷》斯坦因劫走，存大英博物馆。羽田亨拍照了原件，首先发表在《小川博士还历纪念史学、地理学论丛》中，后又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册，题为“唐光启元年书写沙洲、伊州地志残卷”。笔者据羽田文。



从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沙漠图》1979年版为底图

图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略图（胡明霞绘制）

Fig.1 A sketch map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新唐书》的地理志与西域传，记南道上的城镇河流较详，只记有且末水、勿遮水（不明）、建德力河（今克里雅河）、于闐河等，并未记有南河。

检读了上記隋、唐时代的史书、旅行记、地方志三类著作，都不见有南河，这就足以说明，隋唐时西域南道上并没有南河。

公元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晋为了回报西域于闐国的来朝，特遣张匡业、高居海等出使于闐，他们往返四年，“而居海颇记其往复所见山川诸国”，事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据记，他们出古阳关，至大屯城受到了仲云族高官的欢迎、款待，大屯城应是今之若羌（论证见本文第二部分）。又西渡陷河即今之车尔臣河，再经绀州、安州（两地不明所指）遂至于闐。于闐有大水，发源山地至于闐城分流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文中并无南河的迹象。

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经今中亚地区到达和田，循南道而去沙州（即今敦煌），《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这一段的旅途所见，其中并不提南河。

清代徐松身历新疆，他于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撰成了《西域水道记》一书，在其文字说明与全套地图中都找不到关于南河的记载。

以上我们通检了从汉至清十四种有关西域水道的古籍，他们一致地不记南河，难道偌大的一条南河竟会被各种地理书、志一致忽略吗？当然是不会的，从逻辑上看，各书一致，恰恰表明了南河并不存在，不但北魏以前没有南河，北魏以后也没有南河。《水经注》既是记载南河的唯一典籍，因此需要了解一下酈道元的南河之说从何而来。

查《魏书·北史·酈道元传》，他并未到过西域，其注释西域水道依据的是各种古籍，在南河问题上则主要依据《汉书·西域传》与《释氏西域记》。《释氏西域记》乃释道安所

撰,其书早佚,道安生于永嘉六年,青年时期为僧游学于太行山区,后南下至襄阳,声望甚高,他在长安结交过许多西域僧徒¹⁾,但他本人未去过西域,所撰《西域记》得自传闻。郦道元依据道安的间接材料而注《水经》中的西域水道,以致于背离了经文,竟然把于闐河与阿耨达大水(车尔臣河)连贯起来记做了南河,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历检古代文献,虽都无南河之记,但在现代地学著作里是否可以找到有关南河的记录?笔者查阅了下列各书、图。

1. 本世纪初,斯坦因在我新疆进行过大量地理和考古窥探活动,其成果集中发表在《Innermost Asia》及《Serindia》两书中,两书各有大比尺地图数十幅,不论在两书的正文里或地图里,都没有南河的记录。
2. 五十年代末,曾派出新疆综合考察队,对新疆地理进行了考察,现已发表的《新疆地貌》,其中并无南河或其故道之记。
3. 近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塔克拉玛干风沙地貌图》及《中国沙漠概论》等;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新疆沙漠和改造利用》,也无南河的记载。

古今地理著作既都否定了南河之存在,从而也就证明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的水系自古至今并未发生过大的变化。

二、古代南道上的绿洲、城镇

西域南道上的绿洲城镇,各有其演变的历史,了解一下它们的消长、存没,了解一下整条地带上主要绿洲数目的增减,对于探讨南道的历史自然地理将会是有益的。

《汉书·西域传》其记阳关至于闐间的各国(绿洲国),自东而西依次为鄯善(东南有赭羌)、且末(南三日程有小宛)、精绝(南四日程有戎卢)、捍弥(南有渠勒)、于闐(南接赭羌)。这些绿洲国之较大的都位在东西交通道路上,兹分别考定其地址如下。

鄯善 早在汉通西域之前,在牢兰海(相当今罗布泊)地区就有了一个楼兰国,首都楼兰城位在牢兰海西北、河水入海口附近,其废墟的位置,最近经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复测在东经 $89^{\circ}55'22''$ 、北纬 $40^{\circ}29'55''$ 。元凤四年(公元77年)汉军攻破楼兰,改其国名为鄯善,迁其都于牢兰海西南方之鄯善城,应其新王之请,派出官兵屯田驻守于其国之伊循城以支援新王。鄯善城何在?它与伊循城的关系若何?对于这个问题,东西方学者争论甚多,本文先考求两城故址如下。

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宋云等(已见前文),穿过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出今茫崖山口,抵达鄯善城,又西行“千六百四十里”乃抵左末城(即且末城)。依记,鄯善城在今茫崖山口以西至今且末的路上,在宋云西行的同时,郦道元正在撰写《水经注》,注说鄯善国都在伊循城,位于牢兰海西南方、注滨河(今车尔臣河)南岸。

《隋书·地理志》记:“鄯善郡: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置在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也……统县二,显武、济远”。《隋书》把鄯善城与楼兰城混同了,且未记伊循城。

唐代《沙州图经》(见前)所记为:自敦煌西出阳关(见前),经蒲昌海(今罗布泊)西南约千四百里至屯城。自屯城向西一百八十里至石城镇,其城即隋之鄯善郡城,隋末荒废。汉鄯善废城在石城镇东二十

1) 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八章;又见松村巧,“释道安的佛教思想之形成与展开”,《东洋文化》62期。

步。当地民族按其传统称石城镇为大鄯善城, 屯城为小鄯善城。

《图经》的这段记载澄清了《汉书·西域传》的含混,《汉书》仅记鄯善“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并未说明伊循城与鄯善城之关系,而《图经》则明白记出,伊循城在东,即唐之屯城;鄯善城在西一百八十里,即唐之石城镇。其次纠正了《水经注》的错误,《水经注》记:“注滨河又东经鄯善国北,沿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依文意则鄯善国都即伊循城,《水经注》显然是参用了《汉书》与释道安的《西域记》,《汉书》所记含混,而道安也只记“南河自于阗东于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所以酈道元就把鄯善国都记在了伊循城。如细读《汉书》原文,鄯善新王向汉朝申请说:“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意思是首都之外另有伊循城。

在《图经》之后百多年,贾耽根据出使人员的报告和外国来唐人员提供的材料,编写了“从边州入四夷道里”,收在《新唐书·地理志》里。贾耽长于地理,所依据的又是第一手材料,故其记颇为可靠。其记云:“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下略)。”文中的七屯城应是屯城,伊循是伊循的传抄之误,伊循城西至石城镇的距离,校以唐代其他图经志书,应为一百八十里,贾耽所记与《沙州图经》前后呼应、基本一致。

把唐代的各种记载与今车尔臣河下游若羌一带的地理结合起来看,形势十分清楚,出古阳关经罗布泊西南约千里所遇到的第一片较大绿洲显然是今米兰绿洲,今米兰农场以东不远的古城废墟即唐之屯城址,汉伊循城址应在屯城西北五十步,今已不可辨认。自今米兰而西一百八十里的另一片大绿洲即今若羌县,唐石城镇址即今若羌旧县城,而汉鄯善故城址应在若羌旧城东二十步,今已不可辨认。

参据文献记载,结合当地地理所作的上述论证,也得到了考古学上的依据。英人斯坦因曾于1906—1914年间四次到过米兰,在他发掘劫走的文物中有很多藏文木简和文书,他从藏文文书中发现了两个地名即大Nob(Nob—Ched)、小Nob(Nob—Chung),简牍的内容表明,小Nob指的是简牍出土地米兰,大Nob指的是米兰西方的Charkhlik(卡克里克即今若羌)¹⁾。

吐蕃文所记之地名大、小Nob,与《元和郡县图志》及《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所记的“纳职”可互相印证。《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伊州下有:“纳职县……贞观四年置,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谓鄯善为纳职,因名县鄯”。文中的“胡”当然不指鄯善人,指的应是随康艳典到鄯善城居住的大批康国人而言,按他们的发音,大鄯善城可呼为大纳职城,小鄯善城则呼为小纳职城。《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在纳职县下也记有:“胡人呼鄯善为纳职”。然则Nob与纳职当是同一称呼的藏、汉文不同音译。把出土文物的记载与古书的记载结合起来,可知今之米兰废墟在唐称为屯城,当地康国侨民称之为小纳职,唐人译之为小鄯善,吐蕃人后来记之为小Nob;今之若羌在唐代为石城镇,康国侨民称之为大纳职,唐人译之为大鄯善,吐蕃人后来记之为大Nob。

关于唐石城镇故址,斯坦因经过卡克里克后曾有记述²⁾,据记,若羌县城座落在一处古城址上,县城东墙外紧接着另一座古城址,它几乎已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一段不足半哩的残墙,当地维吾尔族呼之为Sipil(意为城)。斯坦因记,在他之前,俄国地理学者普热瓦尔斯基于1876年(光绪二年)到若羌,普氏见到的残墙周长约二英里,各面皆有敌楼,其时当地人称之为Ottogush-Shari。普、斯二人见到的若羌县城东墙外的古城址,按方位正是《沙州图经》所记的汉鄯善城故址,若羌县旧城则座落在唐石城镇上。

婁羌 按《汉书》的记载,婁羌位在鄯善东南方,偏僻不当大路,人口千七百五十,“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再参看东汉人的注释,婁羌是活动在南山(指阿尔金山)北麓的羌族部落,确址不明。可见《汉书》所记的若羌并不是现在的若羌县,现若羌县城是汉鄯善城之西邻。

1) A.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Chap. 7, P. 109-128.

2) A. Stein, «Serindia» Chap. 8, Sec. 4, P. 310-314.

且末 《水经注》记，且末河经且末城西，又东流经其北；《隋书·地理志》且末郡下记：“置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萨毗译”，可见隋之且末城即汉以来的且末古城。唐《沙州图经》记：“自汉以后，其名不改，隋大业四年平吐谷浑置且末郡，上元三年改名播仙镇”，并记：石城镇西二百四十里有新城（在今瓦石峡附近），自新城向西，沿且末河行约六百里即抵播仙镇。据上记，古今且末城无大变迁。

精绝 这个国名，自汉至唐都见于史书，《新唐书·西域传》记：“于闐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绝国”，按汉、唐史书记，只能说它位在且末与于闐之间。

本世纪初，斯坦因前后两次到民丰县尼雅河下游的尼雅废墟，他从尼雅劫去了五百多枚佉卢（Kharosthi）文¹⁾木简，其后又在南疆各地搜求，加以罕廷顿（Huntington）的所得，他们共得去佉卢文简牍 764 枚，经多年研究，佉卢简文终于得到了解译，佉卢简文中有不少关于道路和地名的内容，其中较完整的一枚内容如次：

“大王陛下（中缺）Sameka 报告，他已被任为使去 Khotan，从 Calmadana 他们给他以护卫人员而赴 Saca，从 Saca 他们又派给他一名护卫人员而赴 Nina，从 Nina 到 Khotan 的护卫人员应由 Cad'ota 提供。远至 Khotan（中缺）当此密封的简牍呈交给您时，请依旧例对从 Nina 到 Khotan 的护卫人员支付酬劳以及额外补助。请依法做出决定”²⁾。

文中的 Khotan 是今和田，Calmadana《大唐西域记》译为折摩驮那，即今且末，Nina《大唐西域记》译作尼壤，《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写作泥壤，即今民丰县的旧名尼雅，Saca 应为今安迪尔河下游的安迪尔废墟³⁾，而 Cad'ota 即是佉卢文简大量出土的尼雅废墟，斯坦因认为 Cad'ota 即古精绝国。他的比定已被学界所接受⁴⁾。

扞弥 此地《后汉书·西域传》记作拘弥。查《新唐书·西域传》载：“于闐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精绝国，河之东有扞弥，居达德力城（参校上文及同书地理志，达应作建），亦名拘弥城，即宁弥故城，皆小国也”。扞弥、拘弥、汗弥、宁弥都是同一地名的不同译法或传写之差，其国在建德力城。于闐东三百里的建德力河即今之克里雅河（又作克勒底雅河），建德力城即今于田县的旧名克里雅（又作克勒底雅）城。扞弥国在今于田绿洲上。

《汉书·西域传》所记的当道各大国如伊循城、鄯善、且末、精绝、扞弥、于闐等，即今之米兰、若羌、且末、尼雅废墟、于田、和田等绿洲城镇，可见这些绿洲都已有了至少是两千年的历史。由于《汉书》记载简要，各该绿洲的面积和城镇数目已无法知道，有些属于某国的小绿洲也可能被史书省略，可以想像，两千年前西域南道东段上的绿洲数目应该比《汉书》所记多些。至于书中所记的婞羌、小宛、戎卢、渠勒等不当大路的诸小国，他们分别位在各大国之南三、四日路程，可知他们都位在今各条河流的出山口处，都在南方戈壁之上而不在沙漠边缘。

汉代以后，南道绿洲数目的增或减，可以检读后代史书所记，经过比较得出答案。汉代

1) Kharosthi 文，我国译作佉卢文，它是公元前出现，通用在今阿富汗、中亚、西北印度一带的一种文字。印度学界认为它是公元前西北印度人创用的。斯坦因劫去的佉文简中的 709 枚出土于尼雅废墟，而尼雅出土的佉文简中有晋、泰始五年年号（公元 269 年），故斯坦因认为佉文在南疆盛行于公元三世纪，最晚迄于隋代。本文所利用的是佉文简的英译本。见下注。

2) 据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 P.3, No.14.

3) 论证见下文。

4) A.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Chap. 5.

之后，唐代的版图最为广阔，其对西域的记载也较多。

《新唐书·地理志》贾耽记“安西入西域道”：“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古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祆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闐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闐”。文中伊循、鄯善已论证如前，新城等地再分述于后。

新城 依上文在今若羌西二百唐里。《沙州图经》记其在鄯善城之西二百四十里，在且末城之东六百一十里。按方位、里程，相当今之瓦石峡绿洲。斯坦因在瓦石峡村东曾见到一座废城址，他认为即唐之新城（弩支城）址。

悉利支井、祆井、勿遮水 不详所指。

兰城镇 即兰城守捉的住地，据记在于闐东六百里，且末西五百里。据《中国名胜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记，地在今安迪尔牧场西南25公里的古城废墟，但里程与原文所记不合，姑存疑。

移杜堡、彭怀堡 应在今民丰县至于田县之间，但地址不明。

坎城镇 坎城守捉的驻地。据《新唐书·西域传》记，于闐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而坎城镇也在闐东三百里，然则镇城应在建德力河畔。《西域传》记有建德力城而无坎城镇，《地理志》记有坎城镇而无建德力城，按方位里程二者应是一城，按地名坎城应是建德力城的译音缩写（Ken与Ken-dariya），可证坎城镇也即今之于田。坎城镇即汉之捍弥城。

《新唐书》“西域传”与“地理志”之外，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所记于闐以东的路程顺次如下：自于闐王城东三百三十里至媲摩城，过媲摩川东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作泥壤），又穿过沙漠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又东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又东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

对上列地点，西东方学者考证甚多¹⁾，现参考前人意见，论证如下：

媲摩 斯坦因认为是今策勒县老达木沟废墟北边上的Uzun-tati。他的说法有两个疑难，第一，玄奘记媲摩在于闐东三百三十里，若比定在Uzun-tati则嫌其距于闐过近，里程与玄奘所记不合。第二，玄奘东归时于闐东境早有汗弥国、居建德力城，它是汉代以来的绿洲国，一向为旅行家所注意，按距离、建德力城在Uzun-tati东几十里，相隔不远，然则玄奘何以在媲摩停留且有记，却不在建德力城停留，更不记建德力城？按原文所记里程，结合地理条件，把媲摩比定在建德力城为更合理，笔者主张媲摩即捍弥即建德力城也即今之于田，稍东的媲摩川即今之克里雅河。

尼壤 《慈恩传》作泥壤，地即佚卢文简中的Nina。有人主张尼壤指今尼雅河下游的尼雅废墟，那是不妥的。尼雅废墟的佚卢文记法是Cad'ota（见前）不是Nina。且玄奘记尼壤的地理景象是“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苇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而瞿萨旦那以为东境之关防也。”这与尼雅废墟地处河之下游，聚落、果园、水渠遗迹夹河迤邐不断的景象相比显然不同。从这两个条件看，尼壤只能是现在的民丰县，民丰的旧名正是尼雅。

覩货逻 玄奘记，从尼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斯坦因在安迪尔河下游废墟考古后了解到安迪尔废墟位在今民丰至且末之间，清末的旅行者还把迂迴经过安

1) 主要参考：堀谦德：《解说西域记》，大正元年，前川文荣阁版。长泽和俊：《玄奘三藏》，昭和五十三年，桃源社版。A.Stein：《Ancient Khotan》1907，Oxford版。A.Stein：《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等。

迪尔去且末的路当作常用的支路¹⁾。斯坦因本人就是从尼雅(今民丰)经安迪尔去且末的。又加以安迪尔有唐代古城遗址,故比定其地即玄奘所记的覩货逻,后来又从卢简文中几处读出了Saca这个地名,比定Saca也即覩货逻。他的判断是可信的。

覩货逻做为旅途上的重要休整地之一,为何位在安迪尔河下尾而不是在今安迪尔兰干?这是地貌条件使然。安迪尔河出山北流,河床深切入戈壁之下,在今安迪尔兰干一带,河床深切十多公尺,两岸谷壁陡峭,致使沿岸的戈壁和流沙地面不可能汲引河水,因而中游两岸虽然近水却是一带荒漠,不能形成绿洲,没有聚落,也就不能给旅行者提供憩止之地。安迪尔兰干,乃是清朝地方政府特设的一个交通站。河道愈向下游,河谷愈为开扩、低浅,至下尾、今安迪尔牧场一带,河道进入了平地,枝流歧分,洪水季节漫衍甚广,形成了大片绿洲,安迪尔废墟即在一支古河道的下尾处。由于上述地理形势,古代从尼雅至且末之间的道路,为了赶赴绿洲,自然要走一个勾股形,经过覩货逻而去且末。

折摩驮那 《大唐西域记》原文此句未云:“即涅末地也”,而《慈恩传》卷五云:“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沫地也”,可知其地即且末,折摩驮那是Calmadana的音译。

纳缚波 玄奘记云:“复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且末东北百余里的楼兰故地,显然即前面已论证过的鄯善城,即今若羌县境。至于纳缚波这个名称,在这里是初见,必是玄奘按当时当地民族的称呼而写音,其含义有人认为出自当时的粟特语Novapa,其发音与米兰废墟出土的藏文文书中的Nob相近。

把唐代史书所记的上列地点,与汉代史书所记地点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唐代于阗以东的绿洲城镇又多出了几个,它们自西而东是彭怀堡、移杜堡、兰城镇、覩货逻、新城等五处。我们所检读的上列唐代史书,都成于公元八世纪以前,与公元一世纪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时相比,唐代于阗以东的绿洲是增多了而不是减少了。这种现象并不单是调查工作和文献记载前进了的反映,其本质乃是人民群众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工作中又有前进的反映。

唐代而后绿洲、城镇数目的增减,不必再一一检读史书,只需看看清末王树枏、袁大化所编的《新疆图志》,以及各地方奉命依例编撰的一套《新疆乡土志》就可以了。上举两种地方志里所记和田以东的城、镇、聚落,比之汉、唐又多出了若干处。清代所记与现在的地理调查结果表明,两千年来,和田以东的绿洲、城镇是在逐渐增多而不是逐渐减少,这说明在历史时期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在与沙漠斗争中,不断取得了胜利,总的趋势是前进而不是后退,是胜利而不是失败。至于局部的失败,那是有的,局部的失败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要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三、几个绿洲的兴替和交通道路的变迁

上文已述,南道和田以东的绿洲数目在历史时期是逐渐增多而不是减少,但地理考察和田野考古发现,和田以东又确有若干处废墟,这些城堡居住区之被放弃,甚至比绿洲之增多更为引人注意。随着某些绿洲的荒芜废弃,联系在它们之间的道路也随之而发生过变迁。这些现象的实质是什么?有待深入研究,兹从历史地理角度对米兰、安迪尔废墟作些初步探讨。

- 1) 清、宣统三年王树枏编《新疆图志》,卷82,道路四,于阗支路条下记:“……一百四十里尼雅,八十里列克里克,九十里雅通固斯,八十里雅可托和拉克,二十里额底里什,一百里安得悦,其地土旷人稀,若开渠安户,可成沃壤,即覩货逻故国也,……” 安得悦即安迪尔。

（一）几个绿洲的兴废

《大唐西域记》描述玄奘等经过覩货逻时的景象说：“国久空旷，城皆荒芜”，描述折摩驮那的景象是“城郭隳然，人烟断绝”，可见两地在那时是被废弃了。荒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沙漠化的结果？如果沙漠化了，那么今日的安迪尔和且末绿洲与古代的覩货逻和折摩驮那荒城的关系又是如何？

玄奘过此之前覩货逻和折摩驮那的情况。《汉书·西域传》记且末国，公元一世纪时居民有230户、1616口人，是当时南道上较小的国。宋云公元519年过且末时记其“城中居民可有百家”，虽不是且末全地区的人口，但比之汉代是少了。这样一个位于干旱地区的寡民小国，生存的条件比较艰苦，其政权力量也较脆弱。从地理位置看，它在和平时期虽可以通好友邻各国，但在政局混乱、弱肉强食之际，却必是易受摧残的弱者。据《魏书》、《隋书》“吐谷浑传”载，且末在公元五世纪初已隶属于吐谷浑，公元445年北魏击吐谷浑，其王慕利延率军西度流沙，奔袭于闐，杀于闐王而夺其地，死者数万。且末地处要冲，在那次战乱中遭受吐谷浑的劫掠是可以想象的。《魏书·西域传》又记，蠕蠕曾侵掠于闐直至其城下。蠕蠕基地远在漠北，其侵于闐必经鄯善、且末，且末既在当道，受蠕蠕军之劫掠自是难免。又据《南齐书·芮芮传》，公元491—493间，南齐遣往丁零的使臣报告：“鄯善为丁零所侵，人民失散殆尽”。丁零也是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南侵鄯善（今若羌）也要走蠕蠕南下的道路，鄯善既遭侵掠，且末恐难倖免，此外、不见于史书的兵燹掠也不少，且末立国之难可以想见。

公元七世纪初，隋朝统一了中国，隋在鄯善、且末分别设置了郡县，行政管理一如内地。《隋书·食货志》记，为了巩固且末这个边疆小郡，隋朝不得不流放罪人到且末屯田、戍守，为了支持且末官兵的生活，不得不强令关中地区的富户出驴向且末运送粮食。依赖罪人屯田和内地运来的粮食才能勉强维持，可见当时且末郡之贫薄脆弱。

隋末纷乱之际，鄯善镇城被废弃（见《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沙州图经》记，隋末中原纷乱之时，驻在且末的凉州兵士等逃回敦煌，揆之事理，屯田的罪人们乘混乱之机也必逃归内地，抢掠当然会发生，“城郭隳然，人烟断绝”当发生在隋末。从隋末到唐贞观十九年玄奘过此，其间相隔约二十六年，玄奘见到的是且末荒废之后尚未恢复的景象。

覩货逻的废弃，史书无记，但从当时的历史看，它的废弃应该是和且末、鄯善同时，同一原因。

上述情况虽属史实，但它并不能说明当时当地的地理条件是否恶化、是否沙漠化，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看两地荒芜之后短时期内能否恢复，能否逆转。

且末等地荒芜的时间并不长，从两种史料看，玄奘过此后最多不过三十年，两地就都恢复起来了。贾耽的“边州入四夷道里”及《沙州图经》均记，高宗上元三年（公元676年）改且末为播仙镇，既名为镇，足证其已恢复，而且恢复必早于改名，即是说且末的恢复应在玄奘过此之后到上元三年之前。

覩货逻也恢复了，斯坦因到安迪尔考古时，曾在古寺破壁上发现了刻有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字迹的残碑，然则城堡、聚落的恢复必早于建寺。

总之，覩货逻、且末、鄯善等城的荒废是在隋末、唐初。到了贞观某年，康艳典率人改

建了三处新城,这带地方即转入了恢复期。且末、靛货逻也陆续恢复起来了。这些情况表明,且末等地的废弃并不是长期的而是短期的,并非未曾逆转而是逆转了的。这就足以证明其荒废的原因不是地理环境恶化的结果而是政治、军事性破坏的结果。

鄯善、且末、靛货逻虽都恢复了,但情况却各有不同。康艳典在鄯善旧城西二十步筑的新城就是今若羌县旧城的前身;且末城的位置从《沙州图经》的记载看长期未变;两处的城镇一直延续到今。唯靛货逻到现在却是一片废墟。斯坦因发现的文物表明,玄奘所记的靛货逻后来恢复了,有开元七年的残碑为证。大量藏文文书的出土,正表明了天宝之乱时吐蕃进入了靛货逻,其后再无其他时代的文物出现,表明了吐蕃撤退后这里又陷于荒废。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在废墟西方十来公里处又形成了安得悦(今译为安迪尔)绿洲聚落(今民丰县安迪尔牧场)。这是为什么?野外观察的结果是,安迪尔河下尾在历史时期曾两度向西摆动,安迪尔废墟位在最东的一条古河道畔,中间的一条古河道畔并无废墟,而今日的安迪尔牧场则位在西边的新河道两岸。旧绿洲虽荒而新绿洲兴起,河道向西摆动则绿洲也随之向西迁移,安迪尔河下尾的绿洲从未消失过,它只是随着水源的迁移而迁移罢了。就安迪尔废墟而论,吐蕃人的撤退、城堡的放弃乃是政治、军事行动的结果;其后未再被利用正是由于河流改道西移,失去了水源之故。

米兰废墟的问题,与安迪尔废墟颇相类似。上文已论,米兰废城址即唐之屯城,汉之伊循城址应在其西北五十步,今已不存。唐代以后缺乏文献资料。斯坦因在其地考古,发现过许多藏文木简及文书,说明它和靛货逻曾同时被吐蕃所占,吐蕃撤退,城乃荒废,未再恢复。野外考察所见是废墟位在今米兰河以东的两条古河道之间,由于河流下尾向西摆动,占河道干涸,古米兰也就被废弃,而新河流下尾则形成了新的米兰绿洲。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罕廷顿到米兰考察时,新的绿洲上已有聚落名为米兰,住户只有15家,他们每年春季到此耕种,秋收后即返回北方一日行程的阿不旦(Abdal)去,耕种的土地二、三年即放弃而另辟新地¹⁾。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在米兰建设了国营农场,原来的五十多户个体农民已成了农场职工。当地传说,米兰是蒙名(含义不明),最老的米兰即今之米兰废墟,由于河水干涸,居民迁向阿不旦(Abdal,亦称Omdan),那里可以说是第二个米兰,而现在的国营农场址则要算是第三个米兰了²⁾。这一说法,颇能说明米兰变迁的经过,说明了米兰绿洲和安迪尔绿洲一样,是随着河流改道而迁移的。

(二) 交通道路的变迁

《汉书·西域传》对南道上各绿洲国是循着道路自东而西依次记载的,其顺序正是当时路程的记录。依记:出阳关,经牢兰海西南、过伊循、鄯善二域,沿注滨河(且末河)两岸而趋且末。自且末向西,向西穿过沙漠趋精绝,由精绝经捍弥抵于阗。且末至精绝之间则没有地名。

前文已述,尼雅废墟出土的佉卢文简中,有一片较完整地记载了从且末到于阗沿路上的各地点,依次是 Calmadana、Saca、Cad'ota、Nina、Khotan。Saca 位在 Calmadana 至

注1) 见E.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1907. P.242以下。

2) 米兰国营农场,退休老干部萧参谋长介绍。

Cad'ota之间表示道路经过其地。且末至精绝（尼雅废墟）间有两片绿洲即安迪尔、雅通古孜，前者面积既大又有古城废墟，因而可以肯定Saca指今安迪尔废墟所在老绿洲而言，它也即玄奘所记之覩货逻故国。佉文简的记录表明，唐代以前的古道从且末而西曾是经过今之安迪尔、雅通古孜，再趋今尼雅废墟，而后沿尼雅河南行，过今民丰、于田而赴和田。道路经过Saca与精绝是因安迪尔河的绿洲不在其中游今安迪尔兰干一带，而在河流下尾，古代旅行者为了赶赴绿洲以求憩止，当然要取道Saca。从Saca趋精绝经今雅尔通古孜河下尾绿洲，乃是一条距离短、途中有憩息地的道路。

精绝初见於《汉书·西域传》，户数480，人口3360，有兵500人。其后直到唐朝，史不绝记，但只记国名，不记任何情况。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工作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缺，公元1901年、1906年斯坦因两次到尼雅废墟考古，1905年罕廷顿也曾到尼雅废墟考察，据他们报告，尼雅废墟位于尼雅河下游，距今民丰县城约57哩处，遗址沿河两岸断续约14哩，遗址有城堡、村落、葡萄园、水渠、街道等等，大部遗址并未沙埋，有大片地面经受过风蚀。据罕廷顿1905年考察，尼雅废墟是洪水期河道的末尾，也是胡杨林的北限。斯坦因和罕廷顿都认为古精绝并非由于沙埋而废弃，更不是河流改道的结果。

关于精绝的废弃时间，在斯坦因劫走的佉文简牍中，最晚的纪年是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当地虽然出土过汉钱和汉代文物，但却无唐代文物和唐钱，因而可以推测它的荒废大概是在西晋末年，中原政局纷乱之际¹⁾。由于精绝的荒废，到了唐代，南道就不再经过精绝，《新唐书·西域传》虽然仍记有精绝，但尼雅废墟中不见唐代遗物，因而很难使人相信精绝当时犹在。在贾耽的“从边州入四夷道里”一文里，且末之西即记兰城镇而不记精绝；《大唐西域记》记玄奘过媲摩城即直趋尼攘、覩货逻，也不经精绝。这颇可证明精绝在唐代已废，尼攘则已兴起，故东去的旅行者们改走尼攘而不再去精绝。尼雅废墟至安迪尔废墟之间，直到本世纪初仍是可以直通的，斯坦因考古就曾几次从尼雅废墟向东穿过沙漠，再经雅尔通古孜而趋安迪尔废墟。

（三）南道东段的问题

目前的南道，和田至若羌间都铺建了公路，交通无阻自不待论，问题是从若羌向东至古阳关、敦煌一段近已无人再用，对此，这里姑且做些初步探讨。

若羌—阳关道路，在唐代当然是畅通的，上文已引据《新唐书·地理志》、《大唐西域记》等文献作了介绍。应该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唐代（去今一千多年前），道路沿线也是荒漠，《沙州图经》记：“从屯城取碛路、由西关向沙州一千四百里，总有泉七处，更无水草”。从屯城（今米兰）到沙州（今敦煌）的一千四百里长途上，只有七处水泉，足证其干旱。

五代高居海一行的出使于闐，走的即是阳关路，前文已述。

北宋的版图虽已不及西域，但西域与中原间的往来却并未间断，于闐与北宋京城开封之

1) 本段的描述、分析，依据下列文献：

E.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1907. Chap.9.

A.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Chap.5,6.

A. Stein, «Ancient Khotan» Chap.10, 11.

间的交往尤多,其大事皆载在《宋史·外国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于闐、《文献通考》四裔第十四等章之内,兹略举其要:

“乾德三年(公元965)于闐僧二人来开封,是冬、沙门道元自西域还,经于闐,与其朝贡使俱来。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于闐国遣回鹘人为使来朝,宋真宗询以旅途事情,答云:“涉道一年,昼行暮宿不知里数,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闐,道路清谧,行旅如流”。

熙宁(公元1068—1077年间)以来,远不踰一、二岁,近时岁再至,所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

上举三条,说明公元十至十一世纪间,于闐国官民人等到宋京开封来者甚频,而于闐至沙州间的交通则是“道路清谧、行旅如流”。往来入中有官员、僧侣、商人,运到开封来的不但有西域的产品,还有远自今阿拉伯半岛南部转贩来的乳香,波斯湾贩来的珍珠,红海来的珊瑚,以至非洲来的象牙等等¹⁾。

公元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马可·波罗一行就是从今若羌向东,取阳关路而抵达沙州的,事见《马可波罗游记》。

清末,陶保廉随父经今安西、取星星峡、哈密一路去乌鲁木齐上任。他在安西时采访过当地官员,据悉安西巡抚曾派员专程探查过南道,他们都提交过报告与地图,陶保廉在《辛卯待行记》²⁾卷五中即依据他们的调查报告编写出南道的路程记。据记,清末尚有出阳关、经历若干地点(查对不清)至阿不旦(Abdal),再南去若羌的路,但陶氏又说:“汉以二关为西域门户,自敦煌至盐泽(指罗布泊)往往起亭,唐宋以后沦入流沙,杳无人烟。今赴新疆必取道哈密,不能径达于闐”。清代知名学者如洪亮吉、徐松、林则徐等人入疆都走的是哈密路,都有纪行之著;但南道“唐、宋以后沦入流沙”之说则是主观想象,因为不但宋代南道上“道路清谧,行旅如流”到了元代初年还有马可·波罗一行人通过,直到现在,若羌去古阳关仍是可行的,据米兰农场干部介绍,从米兰去敦煌,“一路是戈壁,有水泉,无沼泽,有卡车队走过”。至于南道即阳关道之荒废,正如黄文弼先生在其《罗布淖尔考古记》绪论中所分析那样,由于清代乌鲁木齐繁盛,清代入疆的官民皆取安西—哈密路,阳关一路乃日趋冷落。他的分析基本正确。阳关一路的荒废并不是“沦入流沙”的结果,乃是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发展不平衡使然,这个问题姑且止此。

1) 这些商品的产地,据下列各书:

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版。

G.B.Cressey, 《Crossroads, The Land and Life in Southwest Asia》1960.

W.B.Fisher, 《The Middle East》1978.

2) 《辛卯待行记》光绪丁酉,养树山房刻本。

SEVERAL PROBLEMS ABOUT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THE SOUTHERN ROAD OF ANCIENT "SHI-YU"

Wang Beiche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Bei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gion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is within the realm of the southern fringe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It is situated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between Khotan and Ruo-chiang.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theme includes three problems.

(1) Whether or not a river existed along the southern fringe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It was recorded in "Shui-jing-ju" (A Commentary on ancient river system) that there was a river called "Nan ho" (south river) flowing from Khotan eastward along the southern fringe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and pouring into the "Lou-Lan Sea" (now Lop-Nor). This concerns an important problem about historical geography, that is, whether or not the river system of this region had experienced a fundamental change.

After analysing many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odern geographical works, we find that no Nan-ho existed there throughout historical period.

(2) Did the number of Oasis between Khotan and Ruo-Chiang gradually increase or reduce throughout historical period? Since it reflects whether 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desertification succeeded or failed it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too.

After comparing several records in historical books from Han to ching dynasty, we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Oasis has increased gradually period by period.

(3) East of Khotan several settlements and towns had been abolished, and the main road had been shifted too. What were the causes behind these phenomena?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ruins of Andere, Niya and old Cherchen were select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